

陈炯 主编

中国文化

修辞学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修辞学 / 陈炯主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643-659-6

. 中... . 陈... . 汉语—修辞—文化学
. H1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3297号

中国文化修辞学

- 著 作 者 陈 炯 主 编
责 任 编 辑 周 立 波 王 华 宝
出 版 发 行 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发 行 部 电 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 京 市 中 央 路 165号 邮 编 : 210009
经 销 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照 排 南 京 理 工 排 版 校 对 公 司
印 刷 者 无 锡 春 远 印 刷 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9.375
印 数 1—2000册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7-80643-659-6/H·23
定 价 16.0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性质、对象和意义 | (1) |
| 第一节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源流及性质 | (1) |
| 第二节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对象 | (4) |
| 第三节 | 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意义 | (8) |
| 第二章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文化观 | (13) |
| 第一节 | 文化一词的含义及特征 | (13) |
| 第二节 |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 (20) |
| 第三章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 | (38) |
| 第一节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语言观 | (38) |
| 第二节 |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方法论 | (44) |
| 第四章 | 汉语修辞与伦理道德 | (56) |
| 第一节 | 修辞立其诚 | (56) |
| 第二节 | 得体性原则 | (58) |
| 第三节 | 礼貌语言 | (62) |
| 第五章 | 汉语修辞与地域文化 | (68) |
| 第一节 | 不同层次的地域文化与修辞 | (68) |
| 第二节 | 地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制约和影响 | (71) |
| 第六章 | 汉语修辞与民族心理 | (75) |

| | | |
|------|------------------------|---------|
| 第一节 | 民族文化心理对汉语修辞的制约和影响..... | (75) |
| 第二节 | 汉语修辞与民族心理联想..... | (77) |
| 第三节 | 修辞活动中的文化心理..... | (80) |
| 第四节 | 汉语语言禁忌的文化底蕴..... | (85) |
| 第七章 | 汉语修辞与民族审美情趣..... | (90) |
| 第一节 | 美辞是汉文化的主流..... | (90) |
| 第二节 | 美辞的民族文化之表现形态..... | (93) |
| 第八章 | 中国古代小说语言..... | (102)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小说文本语言结构的演变..... | (102) |
| 第二节 | 中国古代小说语言的人文特色..... | (111) |
| 第九章 | 中国古代诗歌语言..... | (121)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诗歌文本语言结构的演变..... | (121) |
| 第二节 | 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人文特色..... | (135) |
| 第十章 | 中国古代散文语言..... | (145)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类别..... | (145) |
| 第二节 | 古代游记语言的人文特色..... | (150) |
| 第十一章 | 中国古代戏曲语言..... | (157)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戏曲文本语言结构的文化透视..... | (157) |
| 第二节 | 中国古代戏曲语言的人文特色..... | (160) |
| 第十二章 | 中国古代法律语言..... | (169) |
| 第一节 | 中国古代法律语言发展的几个阶段..... | (169) |
| 第二节 | 中国古代法律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 | (172) |
| 第十三章 | 辞格之文化透视..... | (178) |
| 第一节 | 比喻..... | (178) |
| 第二节 | 比拟..... | (187) |
| 第三节 | 对偶..... | (190) |
| 第四节 | 双关..... | (196) |

| | | |
|--------|-------------------|---------|
| 第五节 | 夸张 | (199) |
| 第六节 | 析字 | (205) |
| 第七节 | 借代 | (209) |
| 第八节 | 移就 | (211) |
| 第九节 | 引用 | (215) |
| 第十节 | 叠字 | (217) |
| 第十一节 |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汉语修辞格研究 | (219) |
| 第十四章 | 词语修辞之文化透视 | (227) |
| 第一节 | 汉字与文化 | (227) |
| 第二节 | 词汇与文化 | (230) |
| 第三节 | 成语与文化 | (236) |
| 第四节 | 称谓与文化 | (239) |
| 第五节 | 代语与文化 | (246) |
| 第六节 | 色彩词 | (252) |
| 第十五章 | 广告语之文化透视 | (261) |
| 第一节 | 概述 | (261) |
| 第二节 | 广告语的特征 | (264) |
| 第三节 | 广告语的文化内涵 | (267) |
| 第十六章 | 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修辞学传统之比较 | (282) |
| 第一节 | 跨文化交际与中国文化修辞学 | (282) |
| 第二节 | 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修辞学传统之比较 | (284) |
| 主要参考文献 | | (291) |
| 后 记 | | (294) |

第一章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性质、 对象和意义

第一节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源流及性质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伴随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等研究而兴起的。其渊源可追溯到摩尔根、泰勒、洪堡特等。泰勒在《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讨论了人类的起源、发展、分化对人类文化形成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语言结构和人类精神的关系。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者鲍阿斯和他的学生萨丕尔、克虏伯，以及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致力于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和社会的调查，创立了人类语言学。

最早试图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当属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如葛兰特（Marcel Granet）、马斯伯乐（Menri Maspero）、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他们重点研究汉语和汉族人思维、逻辑的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如罗香林、刘锡蕃、徐松石等开始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着手实地调查，并发表著作。其中徐松石的《傣族壮族奥族考》（1936）和《奥江流域人民史》（1939）的材料丰富，创见较多。罗常培发表《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1942）、《语言与文化》（1950）。以后，随

着对马尔学说和沃尔夫语言学上的种族主义的批判，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成了讳莫如深的禁区。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与开放，中国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陈原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1979）、《社会语言学》（1982）。其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掀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热，并经过几年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出版了一批专著及论文。邵敬敏指出：虽然大家打的都是“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但实际上的一系列理论、原则、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

在国内文化热和文化语言学的影响下，中国修辞学界逐步重视汉语修辞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王希杰在他的《修辞学新论》中提出中国修辞学的科学化与人文化问题。他指出：“人文化，不应当同科学化对立，它其实是科学的内容之一。”在书中，王氏研究了比喻的社会文化制约性和同义文化（指同义手段作为汉文化的历史产物）等。以后，王希杰与李晋荃主持的江苏修辞学会多次在苏州、徐州、南京、无锡等地召开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不少学者发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研究汉语修辞学、汉语修辞与汉文化的关系。

1997年，陈炯发表《中国文化修辞学论纲》（《江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中国文化修辞学探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提倡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并对其性质、任务及一些理论问题作了探索。他指出：“中国文化修辞学是一门探讨

邵敬敏：《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载《语言文字运用》1992年第2期。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第328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汉语修辞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新的边缘学科。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汉语修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研究中国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制约和影响。” 文化修辞学介于文化学与修辞学之间，它既不研究修辞本身，也不研究文化本身，而是着眼于两者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中国文化修辞学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解释语言学的范畴。它可以从地域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审美意识等方面来考察、分析、解释汉语中的各种修辞现象。如比喻这种辞格中许多喻体并非是物理世界的存在物，而是汉人的精神创造物：龙凤、麒麟、九头鸟、七仙女、孙悟空、猪八戒、牛头、马面、狐狸精、王母娘娘……又如为什么对偶这个辞格为广大汉族人民所喜闻乐见？倘从广阔的文化背景考察，便可以看到，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传统思维的二元对待观有关，也与汉人喜欢追求平衡与对称的审美心理有关，当然，更与汉语特别是汉字（方块字）的基本特征有关。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解释是在一般修辞学对修辞现象描写、归纳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一般修辞学对各种修辞现象的描写与归纳，文化诸因素的观察、分析便成了空中楼阁。“当然，中国文化修辞学的解释将进一步推动一般修辞学更高层次的对修辞现象的描写。所以，中国文化修辞学有与一般修辞学根本不同的目的、对象与范围，它不能代替一般修辞学。”

中国文化修辞学是21世纪来临之际，我国修辞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尽管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已注重从文化角度观察修辞现象，但如何建立理论框架，把这门学科建立起来，尚需进一步探索。

第二节 中国文化修辞学的对象

中国文化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

1. 语言作为文化符号的修辞功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的一些词语集中概括了相应文化领域的思想范畴、认识成果、意义体系和价值观念。有人称之为“文化符号”。戴昭铭指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气”、“阴阳”、“五行”，中国封建政治伦理生活中的“忠”、“孝”、“节”、“仁”、“义”、“君君”、“臣臣”、“尊卑”、“主奴”，以及体现中国汉族婚姻制度和宗亲关系的称谓词“夫妻”、“子女”、“父母”、“伯叔”、“舅姑”、“侄甥”等，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符号。我们认为，把在某民族文化建构中起关键作用的词语称为文化符号，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其一，这些词语是一定社会、一定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乃至一切文化活动的体现；换言之，是一定的民族文化的模式的体现。例如中国人习惯于用墙壁、篱笆等来保护群体和家庭的领域和利益。从长城到紫禁城，从工厂的围墙到村落的土墙，以此可看到中国人崇尚筑墙来保护自己的特有的民族文化心态，并产生特有的文化内涵的词语：“众志成城”、“金城汤池”。其二，这些词语有该民族特殊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价值观念。如汉语中的“宗庙”、“状元”、“筷子”、“饺子”等，有人称之为“文化局限词”，即因民族文化、国情的不同，与其他语无法对译。

语言作为文化符号，其运用蕴含着一定民族的文化价值、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加达默尔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第25页，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中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跟一个在其他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其方法是不同的。”例如亲属称呼语，是一定的民族婚姻制度所产生的文化符号。我国古代用舅姑来称呼公婆，这是古代流行的认为表兄妹婚配是最佳婚姻模式的观念及习俗在语言中的反映。“叔叔、伯伯、大哥、二哥、大姐、二妹”等亲属称谓，反映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及封建伦理。拉丁文中的“Jus”，在罗马法中意为权利和义务。而中国的“法”字，原本写作“灋”，根据我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廌”，据《论衡》解释：“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反映了上古利用神裁判的习俗，也反映古代中国人对“法”含义理解的民族心态：一是公正；二是以刑为主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又如“天”的概念在中国人眼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子”、“天帝”、“天朝”、“天庭”等，而英语中sky则无此文化内涵。汉语成语记载了特定的史实和蕴含了深广的文化观念。“歃血为盟”、“口血未干”反映了中国古代诸侯盟誓时歃血（嘴上涂牲畜的血）以示诚意的习俗，“指鹿为马”、“精卫填海”、“画蛇添足”、“刻舟求剑”、“叶公好龙”有汉民族独特的文化渊源。

2. 修辞与文化的关系

汉语修辞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汉语修辞和汉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研究：一，汉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和制约；二，汉语修辞在传播汉文化中的作用。

（1）汉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的地域文化，汉族人的道德观念、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对汉语修辞产生重大影响，并有一定的制约。江南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下三方面与汉语修辞有着非常

明显的联系。”第一，具象思维与比喻。她认为，欧洲人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其思维所遵循的基本上是一种理性方式，如果说在中国比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表达手段，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在西方，比喻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修饰语言的辅助手段。她说：“以比喻为例，从古代留下的大量典籍中，我们觉得中华民族也许是世界上最善于也是最喜欢使用比喻的。”第二，二元对待观与对偶。江南认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待观点与汉语修辞对偶格的昌盛有着某种必然联系。所谓二元对待观，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与相互包含。她说：“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待观点与汉民族喜欢追求平衡与对称的心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是两者虽然是从不同的方面着眼，但旨归却都在于强调事物的联系和效果上的均衡。”区别是：汉民族追求对称与平衡的心理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的驱动，而二元对待观点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但它基本上受到人们意识活动的控制。第三，意向性思维在修辞中的表现。江南认为：“在思维方式上，古人是把认知与情感融为一体，知、情、意是处在一种未分化的状态。在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中，情感因素往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与方向，使认知活动变成了一种主体意向性活动。”中国传统思维中意向性特点对汉语词汇、语法、修辞都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如汉语词汇具有十分浓郁的感情色彩，修辞格有更强烈的情感表现性。

对江南的二、三两点意见，我们表示基本上同意，但对江南的第一点意见，却不敢苟同。我们承认，中国人特别是古代中国人喜欢用比喻，但并不能得出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结论，更不能说中国人的思维是具象思维。事实上，古代中国人也用理性的非比

江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修辞》，载《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

喻的语言来表达思维，特别是在法律语言中，如“诸因官挟势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赃论减一等；将送者，为从坐。”（《唐律疏义》职制律）而且这种观点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如江南在文中提出的法国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论点：“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

陈炯指出：“研究汉文化影响与制约下的中国修辞，不仅要考察汉语修辞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特色，而且要研究中国修辞学的文化精神。”他认为，汉文化影响与制约下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特征是：非独立性与实用性，儒家的伦理性，直观法与归纳法，重视书面语研究。

（2）汉语修辞在传播汉文化中的作用

共同的文化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汉文化是汉民族认同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中起着凝固剂的作用。而渗透了浓郁汉文化的汉语修辞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喜欢用对联（对偶辞格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都喜欢使用汉文化所选择的那些特殊喻体（如七仙女、落汤鸡、诸葛亮、孙悟空、猪八戒、阿Q，而不是堂·吉珂德、于连等），都常用拆字、回环、顶针等辞格，这便是汉语修辞在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方面的积极表现。无锡红豆集团采用“红豆”商标，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著名的抒情小诗，通过象征爱情的信物（红豆），表达相思之情，真挚感人。故无锡红豆集团采用“红豆”商标，因王维的《相思》诗，能引发海外华

法国·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译本。

陈炯：《论汉文化影响与制约下的中国修辞学》，载《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

人思念祖国之情。

可见，在汉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汉语修辞是传播汉文化的最好手段。中国人翻译外国人的姓名、地名、商标、品名及其他词语时，有一种随音衍义的方式。如奔驰Benz，声宝Sharp，可口可乐Coca-cola，乐口福Lacovo等。这种修辞技巧的巧妙运用，蕴含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情调。

在中外交流、谈判中，会强烈感到存在语言问题。这主要是受汉文化影响和制约的汉语修辞的独特性在起作用。中国人特殊的表达方式，特殊的理解方式，外国人对此感到陌生。这种表达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中外交流、谈判中的距离。例如，在中国，言语行为的群体取向观念常涉及隐私，如：“你吃饭了吗？”“多大岁数啦？”“结婚了吗？”“你的工资是多少？”“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关心别人，显示温情。但个人主义取向的美国人非常崇尚“私有”（private）权，个人“隐私”，即使父母也不过问。故他们听到中国人这些问及“隐私”权之事，会反感。又如谈判中，以关系为取向的中国人，常把创造和谐气氛作为双方沟通的重要手段，认为每签一次合同是长期合作的开始。而受个人主义和平行主义关系影响的美国人，并不重视和谐人际关系，其言行过于商业化（business-like），每签一次合同，仅为一次单独的行为过程。故外国商人雇用华人作为商务代理、谈判代表策划人，是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好办法。这显示了汉语修辞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作用。

第三节 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的意义

陈炯在《中国文化修辞学——21世纪我国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一文中指出：“笔者近几年撰文提倡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

并认为这是21世纪我国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他从三方面论述了建立中国文化修辞的意义：

1. 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是对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继承

中国古代修辞学与西方修辞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框架下产生和发展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修辞学独立于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西方修辞学之外，走着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在浓郁的汉文化影响与制约之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形成独特的科学方法与方法论原则。尽管中国古代修辞学是非独立的，它注重实用，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可贵的是，把修辞作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最高境界。这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反映。对《周易》中提出的“修辞立其诚”，中国古代学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解释时往往把修辞与道德礼仪、建功立业联系在一起。唐代孔颖达的解释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为文教，诚为诚实也；外则修文教，内则立其诚，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修辞立其诚，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修辞学传统是有差异的。中国人重视修辞的伦理性，主张修辞立其诚；而西方则比较喜欢把修辞作为战胜对方的手段。

中国现代修辞学是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撞击、交融之中逐步形成的。二三十年代有以王易、陈介白为代表的仿日派和以唐钺

该文刊于《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中国修辞学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

为代表的仿英美派。他们试图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解释汉语修辞现象，抽象出修辞规则，建立修辞学框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平心而论，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其成绩是应该肯定的：它注重修辞现象的描写和修辞规则的抽象，注重修辞学体系的科学性。在继承古代修辞学遗产方面，如研究炼字造句谋篇修辞，修辞格及文体风格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最主要的是对修辞的民族性和人文性重视不够，忽视了“修辞立其诚”的传统，从而使修辞学应有的实用价值受到影响。故我们认为，提倡中国文化修辞学，就是要讲“修辞立其诚”，继承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国修辞学的特色。

2. 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国文化修辞学要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研究修辞，提倡“修辞立其诚”和语言美，这必然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首先，讲修辞，要重视礼貌语言和礼貌态度。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交际十分注重礼貌语。敬语如“圣上、执事、左右、足下”等，谦语如“仆、牛马走、再拜”等。特别是交际过程中的委婉语具有礼貌性。如《左传》记载晋国和齐国的鞌之战，晋将韩厥明明要抓齐侯，却执紼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这里，韩厥要抓齐侯，却说了一大篇好听的话。这是委婉的外交辞令。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提倡运用“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礼貌语，但还不够，中国是一

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文明礼貌语有悠久的传统，修辞学者应根据国情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提倡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文明礼貌语。

其次，讲修辞，要讲合作精神，即交际双方必须有把交际活动顺利进行下去的良好愿望，并且从这个良好愿望出发来组织自己的话语。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指出：“合作精神的核心当然是一个‘诚’字。‘诚’者，诚实，诚恳，诚挚，诚心诚意。从这一点出发，就能够做到平等待人，尊重交际对象。”显然，在言语交际中提倡合作精神，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再次，美辞是汉文化的一个特点。追求话语的优美与含蓄是中国古代修辞的传统。我们提倡中国文化修辞学，也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继承这个传统，要在言语交际中注意民族的审美观，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深入研究汉语修辞的特点。

语言美，语言文明，合作精神，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形象。中国文化修辞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提高全民族的语言修养和文化素质作出一份贡献。

3. 建立中国文化修辞学，可促使我国修辞学研究的深化

中国文化修辞学是一门研究汉语修辞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新的边缘学科。它不能也不应该代替一般修辞学。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属于解释语言学范畴，可以从道德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民族心理、审美意识等方面来考察、分析汉语中的各种修辞现象。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夸张，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比喻，便是地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必须指出：中国文化修辞学的解释是在一般修辞学对修辞现象描写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一般修辞学对各种修辞

现象的描写与归纳，文化诸因素的解释便成了空中楼阁。当然，中国文化修辞学的解释将进一步推动一般修辞学更高层次的对修辞现象的描写与归纳。如此反复循环，可推动修辞学研究的深化。